



对学科问题的三点看法

王铭铭

话都被前面几个老师给讲完了,所能说的就比较少了。想了一下,好像只有三点补充吧。

第一,这次为祝郝先生成为“80后”,送他一个小礼物,是北大做的纪念品,是一对木制镇纸,上面写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是否能形容现在的北大,我不敢说,但是,用来形容郝苏民先生和《西北民族研究》杂志是比较合适的,而且非常符合我们这次会议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刚才几位老师,特别是杨圣敏老师谈到更加开放地去处理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这里还是觉得要兼容并包,但也不能只是包,而且要有一个思想自由,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我很同意几位老师谈到中国这些学科怎样通过和社会更密切的互动,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和在应用方面发挥的余地,特别是周大明老师指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科可能面临着培养的人才,其去向和社会需要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定义。我们怎样通过这些问题认识形成有特色的中国风格的学科?无论是叫人类学,叫民族学,或叫社会学,这个问题都是实在的。不过,我认为,这些学科在“自信”的同时,还是有很多需要跟西方学习的,这里的西方是广义的,不简单局限于欧美,还包括日本和中南美洲。如今我们的学科建设有几个环节需要重视。首先,我们的经典教育不充分。我想,在美国,有经验的学者都知道,人类学入门课一般都需要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来的,而我国国内学科教育,社会学要做得好一点,我们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这三门相关的学科做得可能差一点。第二是,对学科史的成就这个环节,我认为我们工作做得也不充分,其中尤其是分支研究领域,像社会组织、经济、宗教、政治和医疗等等,这些分支领域并没有明确的团队。目前相对强的可能是宗教人类学,因为这几年的发展,但其他方面还处在比较弱的状况中。第三个是我们对区域性的民族志的成就总结不够充分。国内从20世纪初迄今就积累了很多区域性的民族志研究的文本,但是怎样对这些文本加以总结?问题还需要讨论。现在我们这个行里面爱谈整个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地域,它下面有好几个板块,它的民族志的成就都很辉煌。现在的很多民族志研究与遗产有关系,这个问题怎样和遗产有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太多思考。

总的来说,以上这个第二点讲的观点是,科学就是历史,这是一个后现代思想家提出来的,因为科学必须在历史的、学术史的脉络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科学是一种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产物。我们学科建设怎样构造这个关系,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不然就谈不上中国学派。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是多元一体。应该有众多学派百家争鸣。有一些基本概念是相通的,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化的或者机构化的中国学派,像英国的人类学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功能学派,牛津大学的结构功能学派、曼城大学的冲突学派等都跟个别教授的引导有关系。我们还是认为基于科学史的学术研究来进行探讨。

第三,我认为我们这四门学科都应该基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考来想象自己的学科建设。不少西方社会学家已经替我们指出,社会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受民族国家的“规定”,它的规范都来自民族国家这个“单位”。由于民族国家的原型诞生于欧洲,所以,社会科学有其欧洲中心主义。虽然到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势力的崛起,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但欧洲中心主义的衣钵仍旧作为一种“殖民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我们在国内从事这四门学科的研究,体会到的历史与此有关,但又有所不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尤其如此,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子民,我们最清楚地体会到了这个概念的含义。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科学怎样做?这对西方社会科学家来说比较难,因为他们的社会科学的起点和基本是国家学。我们这些学科的同人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体会到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单元与我们历史上所处多元民族状态有区别。我认为,认识这个区别能有助于我们想象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的“另类”社会科学,从而给予世界社会科学自己的贡献。

总的来说,我的意见是:首先,四个学科不仅要兼容并包,还要有思想;其次,要重视几个层次的学术史梳理和教学;其三,要形成真正的学术自信、文化自觉,而不是假自信、假自觉,要在学理上有贡献,就不能局限于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谈问题,要使我们的论述符合学术原理。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



西北民族研究的理论性实践

王建民

自改革开放和学科重建之后,西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学科领军人物郝苏民教授任教60年暨80华诞之际,很高兴我们有“年轻的”“80后”教授郝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建设这些学科。

刚才几位教授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杨圣敏教授开启了对于学科建设的系统讨论,朝戈金、敖其两位教授有更为个人化的感受,周大鸣教授对应用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强调,王铭铭教授在学科发展方面也讲得很系统。我要讲的其实也是老生常谈。

我也从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体会,思考今天的主题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如何能处理好是关键。

第一,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发展中田野民族志或个案研究和学科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郝苏民曾经著文讨论花儿研究,他注意到花儿的文化植被、文化生态和文化产域等问题,强调要把花儿置于仪式当中来研究。研究花儿的人很多,可是怎样才能具有学科视野是个问题。郝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讨论学科研究和个案理论时,在学院式的人才培养途径中,要强调个案研究需要理论的积淀,要有足够的理论储备,但是又